

从《台湾通史》看连横的爱国思想

林其泉*

研究连横的思想,不能不研究他的代表作《台湾通史》。《台湾通史》可说是一个壮丽的台湾历史百宝箱,被遮掩的光明,被遗忘的岁月,都在里面珍藏;那里收藏有苦涩也有微笑,有难忘的耻辱,更有辉煌的业绩——尽管时光流逝,永不退色。《通史》留给人们的何止是思考和回味!《通史》并非是一部纯学术的著作,它闪烁着连横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。本文拟就这方面谈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学者们。

《台湾通史》是我国一个地区性的一部通史,沿袭《史记》的体例,以纪传体的笔法,记载台湾起自隋大业元年,迄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割台止,凡1290年的史实。

连横为什么要写这本《台湾通史》呢?一般人爱说是受他父亲鼓励的结果。连横自己说过,还在他年幼时,其父连永昌用二金买了一部《台湾府志》给他学习,对他说:你是台湾人,不可不知台湾的事。这可说是最早对他从事台湾历史研究的一种鼓励,可不见得他就是这时候下了写作《台湾通史》的决心。那时他毕竟还年幼,又缺少有关的知识,不可能下那种决心。

促使连横决心撰写《台湾通史》,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以后。

1895年,日本帝国主义以一纸马关条约出兵侵占了我国台湾省,时连横才十七岁。他的父亲连永昌也是在这一年离开了人世。国仇、家破、父丧,使得年轻的连横痛苦异常。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,使得祖国领土台湾城廓变迁;进而,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文化和历史进行了一场空前的浩劫。“灭人之国,必先去其史。”(《雅堂文集·台语考释序》)这怎不激起连横的满腔怒火!他担心台湾文化和历史之亡,决心奋起抢救。他说:“夫史者民族之精神,而人群之龟鉴也。代之盛衰,俗之文野,政之得失,物之盈虚,均于是乎在。故凡文化之国,未有不重其史者也。古人有言,国可灭,而史不可灭。……然则台湾无史,岂非台人之痛坎!顾修史固难,修台之史更难,以今日而修之尤难。……然及今为之,尚非甚难,若再经十年二十年而后修之,则真有难为者。是台湾三百年来之史,将无以昭示后人,又岂非今日我辈之罪乎?横不敏,昭告神明,发誓述作,兢兢业业,莫敢自遑,遂以十稔之间,撰成《台湾通史》。”(《台湾通史·自序》)“台湾无史”,这是连横的夸大说法,大概因为他读过《台湾府志》后,“颇病其疏”,深感旧志之不足,所以才这么说。这自不能看成他目空一切、自高自大,而宁可理解为他在强调自己要撰写《台湾通史》责任重大。这一点只要联系他在另外场合所说的话便不难理解了。他说,“考既往之历史,察现在之情形,探民族之特性,立远大之规模”,在于求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(《思想创造论》,载《台湾民报》240号,此处转引邓孔昭:《台湾通史辨误》江西人民出版社第343页)。这里他把写作台湾史的目的,说得再清楚不过了。为了写作《台湾通史》,他不得不忍居“弃地”,而且还得收拾坠绪,“忍垢偷生”,全力以赴。

* 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。

需要提一笔的,按连横自己所说,他花了十年时间才写成《台湾通史》,这是从收集有关资料算起,真正动笔写作是没有这么长时间的。从各方面分析,连横大体是于1914年底或1915年初着手写作本书的。而他着手写作本书的时候,正值日本有人想在台湾组织“同化会”。同化会的含意,在于“日台一体”,要求台湾同胞与日本人一样,对日本帝国主义尽忠诚与义务,其目的在于消除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,好让日本帝国主义巩固在台湾的统治权。所以,组织同化会是日本帝国主义统制台湾同胞言论、思想与行动的一项举措。同时,日本统治者还从殖民者那里搬来它们惯用的统治术以对付台湾同胞。人们不会忘记,俄国占领波兰时下过许多禁令,其中有一条是不准波兰人讲波兰语,而要讲俄语。日本统治者也一样,不让台湾同胞讲台湾话,而要讲日本话。这些目的无非要台湾忘掉自己所自,忘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,做个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。这些都使连横感到:“文运之衰,至兹极矣”,对他来说,“当此文运绝续之时,一发千钧,为任甚重。”(《台湾通史》卷三十四)连横以台湾知识分子的心和责任感,决心写作《台湾通史》,好让台湾同胞永远记住自己的文化和历史,并以此对抗日本的统治。

不难看出,连横决心写作《台湾通史》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于冀民族精神于不坠。我们可以这么说,连横在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下写成了《台湾通史》。

二

爱国主义思想在不同历史条件有着不同的内涵。就连横讲,体现在《台湾通史》一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,最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其一,《通史》明白指出,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;其二,《通史》郑重告诉人们,台湾是中国人开发和建设起来的,书中对开发台湾的大陆移民赞声不绝;其三,《通史》对有贡献于台湾的廉吏予以肯定与赞扬,对为反对腐败政治而进行斗争的起义者亦大加歌颂;其四,《通史》对台湾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,记述得尤其详细,备加歌颂,对反对日本侵略者占领台湾的斗争,更是高歌赞颂。

这里我们要着重提到的,《通史》以极为热情的语言歌颂郭怀一的抗荷起义,歌颂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赶走荷兰殖民者的斗争,歌颂近代以来台湾同胞为反抗英、美、日、法的武装侵略而进行的斗争。歌颂1895年为反对割让台湾而不惜牺牲的战斗。连横对台湾人民反抗异族侵台而进行斗争的歌颂,从某种意义讲,是间接参加反抗异族斗争的一种手段。

异族入侵,异族压迫,势必引起反抗斗争。有人说过,解决人间的矛盾和冲突,有时最好的办法是有冤伸冤,有仇报仇。反抗异族统治、异族压迫的斗争,就是伸冤,就是报仇,伸民族冤,报民族仇。对这种斗争的赞颂,无疑是爱国思想的突出表现。

在这方面我们特别要提到,连横在日本统治台湾期间,在日本人的眼皮下撰写《台湾通史》,在《台湾通史》中放声歌颂抗日斗争的勇士们。他专门为反割台斗争中抗日义军领导人吴汤兴、徐骥、姜绍祖、林崑冈、吴彭年等树碑立传,“特存其事”,传之后世。他赞扬吴彭年他们是“义士也”,“见危授命,誓死不移,其志固可以薄云汉而光日月”,“乌乎,壮矣!”(《台湾通史》卷三十六,“列传八”)这种歌颂不等于公开骂日本侵略者了吗?在日本统治台湾期间,公开骂日本侵略者,这是何等的勇气!如果不是爱国主义思想的促使,如果没有一种不怕死的精神,能做得出来吗?读书人因写书作文惹祸的史不可绝书,令人可畏,连氏何尝不知道?可他毫不畏惧。在他看来,讲出人民想讲的话,比那些装腔作势的文棍来得有意义。这在连横是谓学道有韵不当老学究,是谓用剑必试其锋。就是说,做学问需发其意。连横的意又是什么呢?在于寄托一种思想,一种民族复仇的思想。他曾这样说过:“国仇今未报,男儿死不休。”(连横:《剑花室外集·

招侠》“夫复仇大事也。……若乃反颜事故，以猎富贵，而猥曰智伯以国土待我。噫！是诚犬豕之不如矣。”（《台湾通史》卷三十五，“列传七·孝义·林全筹”）他情辞恳挚激越，念念不忘报国仇，不忘中土，苦心孤诣，坚信台湾必会回归祖国，坚信台湾同胞来日定将重见汉威仪。连横这种爱国主义思想是何等的可贵，何等的可敬！

《台湾通史》这本书，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加以概括，可以这么说：是连横的爱国保种思想的结晶。《台湾通史》的写作与出版何止补旧志之不足，尤其不可忽视的是，它“存正朔于沧溟，振天声于大汉”。在日本占领期间，它成了台湾同胞与敌人作斗争的工具，如今仍不失为寻根认祖的指南。连横的功劳永不可没。

有人说，《台湾通史》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历史均未提到，就因此，可以说没有台湾的近世史而只有“日本殖民发达史”而已。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呢？是的，《台湾通史》只写到1895年反割台斗争失败为止，而按连横原来的计划，要写《台湾通史续编》，记述日本统治下台湾同胞爱国斗争的历史，以明国耻，鼓舞士气，但由于文网森严无法动笔，迫于形势未能成篇。为此，连横深感“此愿未偿”，“别有难言之余痛”。这又是何等之情怀啊！好在毕竟有许多人写了许多有关日本统治台湾的历史，痛斥日本占领者对我台湾同胞的压迫与掠夺，赞美台湾同胞为赶走日本侵略者而进行英勇不屈斗争的精神，这亦可告慰连横的英灵。

讲到这里，也不能不提到，由于时代的限制，连横体现在《台湾通史》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有其局限性。具体说，他是个大汉族主义的爱国思想家。他站在汉族立场，把清政府统一管理台湾这件事看成是异族统治台湾。他骂说：明亡之季“大盗窃国，客帝移权，缙绅稽顙。若崩厥角。民彝荡尽，恬不知耻。”他视郑芝龙投靠清廷的举动是“末节不彰，稽首再拜于异族之马下，抑足羞焉。”而把宁靖王朱术桂在台湾为拒清而自杀的做法说成是“毅然抱大节以陨”。一个郑氏政权的部将不愿降清，在台湾隐居起来以卖卜为生，连横赞不绝口，说他是“怀忠蹈义之士”。说自己撰写通史想为他表彰云。（见《台湾通史》卷二十九，“列传一”）这些无疑都是大汉族主义思想作祟的表现，如今都要重新加以评价才行。

尽管这样，连横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爱国思想家，他的《台湾通史》可称得上“台湾的精神”。连横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层中成长起来的爱国思想家，《通史》是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最能拨动台胞心弦、最能唤起台胞爱国热情的著作之一。

三

这里需要提出探讨的，是连横在《台湾通史》中对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评价似不公平。

连横在《通史》中写道，丘逢甲慨然有报秦之志，“观其为诗，辞多激越，似不忍以书生老也。成败论人吾所不喜，独惜其为吴汤兴、徐骧所笑尔。”这话怎说？1895年日本侵略军逼近狮球岭时，原台湾巡抚唐景崧未战而走，其他的文武官员亦多逃跑，做为台湾抗日的提倡者丘逢甲“亦挟款以去”，款挟多少？“或言近十万。”（《台湾通史》卷三十六，“列传八·丘逢甲”）

这“挟款而去”的话，或说乃丘之老友吕康虔（汝玉）所捏造的。毋庸置疑这是可能的。不过，说这话的不单吕氏一人，在易顺鼎的《魂南记》（收入《盾墨拾遗》中）一书中也有记载，只是未点明挟款数，仅说丘与林朝栋、杨汝翼等人“皆拥巨资弃师潜逃。”（转引徐博东：《丘逢甲传》）易顺鼎为当时清廷都察院御史，愤于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行径。1895年曾赴台参加反割台斗争，不但亲自到过台湾，而且多少参加策划反割台斗争的事，看来易的话不会毫无根据。至于挟资数目，也许未必有十万。丘氏为保全自己和己一家人的生命，在不得已情况下逃离台湾，跑时把剩

下的款项一并带走,以免落入敌手。此举未尝不可。因此,似不能对丘氏横加贬斥。而且,综观丘氏一生,不论在反割台斗争中,也不论他内渡大陆以后,表现是好的。还在中日甲午战争刚打起来时,丘氏便想到台湾地位重要性,预计到敌人会谋取台湾,所以号召台胞积极行动起来“抗倭守土”;他自己则着手筹建义军,为抵抗日军入侵做了准备。后来当清廷决定割让台湾给日本的消息传到台湾时,丘氏怒不可遏,带头刺血上书,决心死守台湾。日军犯台时,他确实参加了抗战战争。后来虽然离开台湾,他仍念念不忘国土。在大陆,他写了许多怀念台湾的诗,表明他热爱台湾渴望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。就因此,即使当年挟款以去,亦不应抹杀他的爱国思想和行动。有人提出,要把丘氏的抗日行动和挟款以去分开来评论。这意见似值得考虑。

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连横的批评。连横对丘氏的指责似过份了些,但也因此体现出连的爱国情怀。试想,如果连横对丘氏挟款以去一事无动于衷,或避而不提,那样他与为编史而编史的做法有什么两样?那样做又怎好说是爱国历史学家?正因为他对逃跑者特别是对挟款逃跑者的严厉指责,使得至今人们读《台湾通史》时,还能听到连横的掷地有声的铿锵语言。人们似乎听到连横这样说,多少志士为国土而献身,而你们一批当官的和绅士却自己逃跑了,逃跑时还要挟款以去,太不象话了。连横在《通史》中使用的语言近乎骂,但骂得有根据有道理。当然,这一骂对以后影响很大。这也许是他当时所未想到的;也许他想到了,不过他想的绝不是给爱国者抹黑,恰恰相反,要让那些贪得又怕死的劣货遗臭千古。

如果经过考证,丘氏当年确实未挟款而去,无疑这事要予以更正,这对丘氏是有必要有意义的。但绝不能因此反过来批评指责连横。说他草率作文,无事实根据乱说云云。怎么能说是无事实根据呢?易顺鼎的话就是根据。你丘逢甲中途跑了就是事实,难道这些都要加以包庇?当然不能这样。这正表现出连横的历史学家的爱国情怀和责任心。对于这些,我们只能颂扬,决不能非议,更不能指责。这里我们所要做的倒是,对那批官吏和绅士临阵逃跑这件事以追根究底的研究,从中看出连横所使用的语言的份量。

四

为了进一步说明连横的爱国主义思想,我们还可以从两方面做些对比分析。

其一,日本侵略者侵占台湾统治台湾这件事,对台湾同胞和全中国人来说是荣幸还是耻辱,不能看成是一般的认识问题,而应看成是奴才与爱国者的分水岭。这是我们评价连横时所不可忽视的。

近来人们不时可听到这样的说法:台湾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其所以比较快,主要是由于日本人在台湾经营五十年打下良好基础。那就是说,台湾会有今天,应感谢日本人对它的占领和统治。这类说法自不是今天才有的,早在1923年,被称为“三脚仔”的辜显荣就说过,“台湾今日的设施,非常发达,假设二十年前哪有这公会堂,哪有此整然的台中市吗?由天理而言,今日支那(中国)各省不但民不得安,而官亦不得安稳啦。所以凡事不可错辨第一。今日二十八年整顿如此江山,比较支那,民国至今十二年还不息兵乱,这样事由良心可以忘记吗?”(引自王晓波:《台湾史与台湾人》,东大图书公司,1988年第259页)很显然,在辜氏眼里,日本占领和统治台湾,是台湾人民的光荣和幸福。做为中国人竟说出这样的话,可谓强盗者的香火子孙!

辜氏讲这样的话,自是与他的身份有关。辜氏早有“台湾头号汉奸”之称。1895年日本出兵侵占台湾时,他自赴基隆谒日本侵略者头目桦山资纪,恭请日军早入台北定乱,并还自告奋勇为日军带路;日本统治台湾期间,他还为之献策,把在大陆实行过的保甲制度推行到台湾,以

阻止抗日力量,同时征集 17—50 岁台民,组织壮丁团,用以讨伐抗日武装。辜氏为此受到日本统治者的嘉奖,日本统治者将台湾食盐专卖权赐给辜氏经营。由此,辜氏发了洋财,成了大富,富冠全台。就是说,在广大台湾同胞被摔进深渊时,辜氏爬上了幸福的顶峰。他怎么不感激日本统治者呢?

感激日本统治者的不止辜显荣一个人,也不单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,直至四十年代中期日本战败投降、台湾归还中国后,还有一些台湾知识分子不忘日本“旧情”,有人竟在日本文艺杂志上写文章说,你们管了台湾五十年,一旦投降,就放弃我们不管了吗?字里行间表现出控诉、埋怨、不甘心,令人不忍卒读。这些甘心当亡国奴的人,是多么的可悲又可叹!(叶曙:《五四运动带来了新文化运动并打倒了旧礼教》,见台湾《传记文学》第 376 期,1993 年 10 月)

做为台湾知识分子的连横又是怎样的呢?他把日本侵占和统治台湾看成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,日本帝国主义给台湾带来的种种灾难,他永不会忘记。他到过日本,经马关时写了这样的诗句:“落日荒涛望天来,不堪回首是台湾”,“廿年三过春帆下,独自无言对马关。”他把台湾的希望寄托在祖国大陆,把大陆看成是台湾同胞求解放的坚强后盾,“欲求台湾之解放,须先建设祖国。”他不但自己关心祖国,还要儿子回祖国大陆“效命”。(《连雅堂先生家传》,见《台湾通史》,商务印书馆,下册)这种思想境界与那些甘当亡国奴的人相比,相差何啻千里!

辜显荣和连横同是台湾出生的大陆移民的后代,日本侵占台湾时都是年青力壮的小伙子,两人都面对家园遭劫的灾难,可他们想的和做的完全不同:辜氏为出人头地,竟不惜出卖灵魂,连横为寻找解救台湾的真理,向台湾同胞抛出自己赤诚之心;辜氏罪恶的脚跟染上台湾同胞的血迹永远洗不清,连横用自己血和汗写成的文字,一直放射出耀眼的光辉;一个卖国,一个爱国,泾渭分明。辜氏仰日本强梁之鼻息,实不过是宴府之狗才,唾沫之来何用身后?连横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孤傲性格,不屈不挠,其爱国思想犹如发源于台湾高山的一道江水,从不停止其奔流、汹涌。

其二,是坚持台湾与大陆统一起来还是主张把台湾从大陆分离出去,这不是一般的思想方法问题,而是衡量爱国与卖国的标尺。这也是我们评价连横时所不可忽视的。

有那么一些人,以精通台湾历史自诩,把一部台湾史说成是独立与反独立的历史。他们说。台湾是一个有自己风习和利益的集体,是一个单独的民族,要永远脱离大陆,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。这些人就是通常所说的“台独”派。还有一些人还是在台湾掌握权柄的国民党人,虽然不说要把台湾独立成一个国家,可他们要让台湾与大陆的分裂合法化、永久化。这些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“独台派”。他们把主张台湾与大陆统一起来的人骂为“吴三桂”。如此等等。

上述两种人当然不知道,或者根本就不想知道连横始终把台湾与祖国大陆紧紧连在一起。在《台湾通史》中。连横明白指出,“台湾之人,即中国之人也,而又闽粤族也”。“洪维我祖宗,渡大海,入荒陬,以拓殖斯土。为子孙万年之业者,其功伟矣”。“我台人当溯其本,右示后人,以毋忘葦路蓝缕之功也”。为此,“凡我乡士,及我友朋,惟仁惟孝,义勇奉公,以发扬种性,此则不佞之帜也!”(见《台湾通史》“自序”以及卷一“开辟纪”)这里,连横讲得清楚,台湾是中国人开发起来的,台湾人就是中国人,台湾人不可忘祖。即使在日本占领下,他仍看到“国光远被,惠及海隔”,他并指出,异族侵占使台湾处于黑暗之中,可复旦有日。在给友人信中,连横写道,“弟仅此子,骅不欲其永居异城,长为化外之人,是以托诸左右,昔子胥在吴,寄子齐国,鲁连蹈海,义不帝秦;况以轩黄之华胄,而为他族之贱奴,泣血椎心,其能无痛?所幸国光远被,惠及海隔,弃地遗民,亦沾而露,则此有生之年,犹有复旦之日也。”(引林其泉:《台湾历史故事》(下转 64 页))

“漂亮”的国度,心甘情愿地投入它的怀抱。彭明敏关于选择“统治者”这段引人注目的谈话,爱憎取舍十分鲜明,可是事关中国国土完整和全体台胞前途命运,用什么“讲笑话”就能掩盖掉或轻轻带过的吗?!

已故台湾作家钟理和先生有句名言:“原乡人的血,必须流回原乡,才会停止沸腾!”台湾客家人把大陆中原叫做“原乡”,也就是闽南人说的“唐山”。钟先生的话体现了台胞世代代认祖归宗、叶落归根的理念和情怀,而彭明敏所说的一切同“我们祖先的坚持”是完全背道而驰的。用他说的话回答他自己就是:台湾 2000 万同胞,是不会再被当做“别人过渡的、暂时的工具和手段”,而将“生命和前途断送掉”了!

注释:

①本文所引彭明敏在台大法学院的演讲,均引自台湾《民众日报》1993 年 11 月 3 日发表的全文。

②见《辞海》“命”字条目。

③引自斯大林《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》。

④⑤引自连横《台湾通史》。

⑥引自台湾《传记文学》6 卷 3 期黄季陆文。

⑦引自鲁迅《而已集》“写在‘劳动问题’之前”。

⑧引自 1993 年 3 月 9 日台《自立早报》报导台“经济部长”江丙坤语。

(责任编辑 杨立宪)

(上接 36 页)集·连横写史》)爱国情怀,国家统一思想,跃然纸上。在日本占领台湾期间,连横想的是国家统一并把希望寄托在祖国大陆,这种思想何等难得!与他相比,那些“台独”、“独台”们,其思想境界显得低下了。难道他们不该从《台湾通史》中得到一些启示吗?

《台湾通史》如同一盏历史明灯,照亮台湾同胞寻根认祖的道路,不论在当年或今天都有其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。也就因此,连横的名字很自然地与台湾历史相联系。在海峡两岸同胞心目中,连横的形象显得高大。真可谓国家不幸史家“幸”,巨著长篇动人心,《通史》一书垂千古,统一不忘祭连翁。

(责任编辑 杨立宪)